

东方的曙光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格追寻
杨昊成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东方的曙光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格追寻

杨昊成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东方的曙光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格追寻

杨昊成 著

责任编辑 胡新群

出 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高 淳 印 刷 厂
(高淳县丹凤新村 75 号, 邮政编码: 2113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45 6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200 册

ISBN 7-5343-3269-9

G · 2975

定价：9.1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茫茫夜	1
第一节 千年失落	3
第二节 穷则思变	10
第三节 决堤	19
第二章 洪流中	26
第一节 人生派	27
第二节 妖孽 谬种	52
第三节 玩世不恭	66
第四节 呐喊苦闷	73
第五节 躲进小楼成一统	93
第六节 远离尘嚣	132
第七节 革命派	140
第八节 在政治的舞台上	155
第九节 新儒家	170

第三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	181
——鲁迅的方向	181
第一节 “超人”哲学 “摩罗”思想	182
第二节 手执钢鞭	189
第三节 荷戟独彷徨	196
第四节 风波浩荡足行吟	204
结 语 而今迈步从头越	214
参考书目	219
后记	222

第一章 茫茫夜

讲起两千年中国文化，精华也好，糟粕也罢，或褒或贬，或爱或恨，有一点是差不多谁都承认的：儒学统治了中华民族。这一现象其实在世界文明史上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一种学说，历经千年的曲折而可以岿然不动，压制、支配了一朝又一朝有知识无知识的心灵！我们现在当然是理直气壮地在诅咒过去的荣耀了，因为恰恰是这一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荣耀，一步一步将一条本可以腾飞的东方的巨龙，困在了污水泥淖之中。但究竟何以会如此的呢？仅仅诅咒大约是没有意义的。“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恩格斯）儒学的实质是什么？它有无合理的因素？它的产生发展经历了哪些变迁？何以迟迟产生不了独立的心灵与人格？在这一章里，我想对茫茫长夜作一简要的回顾。



知其不可而为之。

第一节 千年失落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其核心是“仁”，因此也就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仁”是什么？说者纷纭，主要好像离不开“爱人”的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孔子注意的中心倒是在人。但孔老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要“爱人”的呢？大家知道，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虽然他首先是思想家教育家，但于政治实在未能忘情。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无非是要君主们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游说是失败了，人家不听他的，还笑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迫于无奈，才退而修书，回到了教育家的位子上。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过渡时期。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一段。奴隶是什么呢？是工具，不过会说话罢了。奴隶主的凶残，先是导致奴隶们的大量逃跑，而终于引来此起彼伏的反抗。社会到这个时候，说明现存的制度已经朽腐，必须摧毁而以新的进步的制度取而代之。孔子处在这个时期，他的主张却是相反，他说要“仁”，一方面叫统治者“仁”，施“仁政”，强调以“德”、“礼”治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你以“德”以“礼”治民，你爱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会服治了。另一方面，他也叫百姓“仁”，这就是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己”要“克”不能张，“克己”为的是“复礼”，恢复周礼；“己”不“克”，“礼”难“复”，就没有“礼”了，你也就不“仁”了，

而“仁”与“不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孔子针对这一上一下，提出了他的“仁”的主张，结果当然并没有挽腐朽的社会于将倒。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无情地向更高级形式发展。但有趣的是，孔子这个“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居然毫不动摇地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圣人”！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首先，“仁”的主张虽然服务于孔子的政治目的，但历史地看，究竟还是体现了一定的人道精神，具有一定的人民性。统治者把百姓当畜牲，孔子出来，直截地说，你不能这样，你要爱他们，虽然其言外之意是“否则你现在的交椅就坐不稳了”，但人民到底是少受了奴役的苦痛。所以我说，这“仁”本身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其次，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利用了孔子的思想，尤其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统治者都是有选择地利用，利用其于自己的统治有益的部分，所以汉有汉的孔子，唐有唐的孔子，之后还有程朱理学的孔子，陆王心学的孔子，甚而至于袁世凯的孔子，日本鬼子的孔子。

再次，孔子在提出“仁”的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套关于做人的主张，可算是他的人格理想罢，其中心就是有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对有身份的知识阶级士大夫而言的。孔子不仅承认而且鼓吹并维护等级制度，“小人”一类他是看不起的，因为“小人尽力”，“学稼”、“学圃”是本分，不配与之谈“礼”。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确实厉害，读书人奉为圭臬，

从己身做起，弄得好可致“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很明确地指示了士大夫们努力的方向。“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一旦仕途便算“达”了，升而进入贵族的圈子，由“治于人者”一变而要“治人”，多么风光！所以两千年来，不仅各朝各代的帝王们奉儒学为至尊，莘莘学子尝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甜头，因此也拼命帮着鼓吹。剩下来就只有“尽力”的“小人”了，而“小人”可以不去管他，终于沦为麻木的国民。

说起来，孔子“仁”的思想可算是“爱人”，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仁”终于要受制于“礼”，所以不能说“仁”是“人的发现”，而离独立人格的主张就更远了。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尚有一点积极的光彩的话，那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则愈来愈上了别道。

孔子死后，儒学代表性的继承者是孟、荀两家，不过又都有所发展。“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君民、君臣关系上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孔子的礼教约束。”这种“民贵”的思想很了不起，但绝非尊重人的独立。事实上，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喊出，两千年中一切知识阶级的一切主张，差不多全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来的。荀子比较激进，他以为一味施“仁政”讲“礼治”，不能解决严峻的社会现实矛盾，而商鞅等人变法的大收成效，又给了他极强烈的影响，荀子因此纳法入儒。后世正统的儒生颇有看不起荀子的，说他走的不是正道，原因我想在这里。

秦的统一，众所周知靠的是法治。秦始皇最恨的就是儒

生，他说你们这帮人一天到晚忠义信仁，什么东西？埋了埋了！因此便埋了。埋了不算，为了肃清流毒，还要烧他们的书，这就是所谓“焚书坑儒”。秦始皇有铁的手腕，所以他统一了全国，但“焚书坑儒”毕竟过于凶残，因此又成为秦很快覆灭的因素之一。

秦覆灭，儒学开始复苏。到了西汉，武帝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将儒法结合，所以这时的儒学，“无论在政治主张上，还是在理论形态上，都大大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他“把德治同法治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种统治手段结合起来，把明教化、施仁义同正法度、严刑赏结合起来，把儒家严格等级名分的礼治主张同法家的君权至上、君主绝对独裁的主张结合起来，融为一种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丁伟志：《儒学的变迁》）但汉王朝终究还是结束了，而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儒学也随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老庄思想乘机而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透露了相对清新自由的空气，我们因此就有所谓“自然”、“名教”，“肆意酣畅”的“竹林七贤”，“自骋骥騄于千里”的“建安七子”，雍容洒脱的魏晋风度。

但老庄思想并不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主张，虽然公开反对礼教，但人生态度却是消极的。比如老子，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把儒家视为生命的那些德仁义礼骂得一塌糊涂。但他主张的却是“无为”，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什么是“无为”呢？就是“寡欲”、“绝学”、“不争”，最好是连

话也不要说，“不言”。“道”没有了讲“礼”，那有什么用？“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大家只管埋头喝酒，喝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才差不多又算回到了“道”。这个理想是很迷人的，但想下去终觉得可笑。可能吗？

道及修道体现了某种朦胧的觉醒意识，但其消极虚无的实质告诉我们，那帮潇洒狂放的酒徒，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皇权威严，动摇不得，自己既无经世之雄才，又不肯同流合污，结果是找了一条不合作的路，算作消极的抵抗。所以你别看有些人逍遥复逍遥，或者其实恰是“苦闷的象征”。

稍后，道还是结合了儒，形成了玄学，儒因此走出了困境。但是在儒学再一次登上高峰之前，印度的佛又进来闹了一通。“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一时间儒道佛鼎足而三。但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结构中缺乏真正的宗教情绪，中国人的一时热心于佛，有别于西方或印度那种对宗教的虔诚与纯粹态度。为宗教而宗教吗？不像。是为苦闷或逃避苦闷而宗教。女人削发为尼，男人剃度出家，大约总是在尘世间吃了苦头，没路可走才遁入空门。所以有人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而于成佛却终于并无门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佛教一样地被国人抹上了实用理性的色彩，一如道。

然而，佛学又终于受到了排挤。韩愈以继承儒学“道统”自任，要求“纯正不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及社会原因。道的“无为”以柔克刚，实质是消极甚至虚无的

人生态度，而佛教在这方面就走得更远了，说白了，就是要“出世”，“佛祖”在心中，一心念佛事佛，终有一天会通体光明。这种“光明”的境界毕竟太虚妄了，现实严酷的面孔前，只见其苍白。安史起乱，大唐临危，再要念佛，“国将不国”！儒学因此毫不犹豫地吞灭了佛学，以其积极入世维护纲常的姿态，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这样就到了宋，到了有名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最大特色，就是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哲学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来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借此把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论证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恢恢天理”。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便一项项配套成龙。一个庞大博杂、看去像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钦定，虽曾有陆王派禅宗式的心学起与争雄，但总的说来，直到清末民初，程朱理学的这种正统地位并未动摇。南宋以降的所谓孔孟之道，

实际上已经主要是指程朱理学。

——丁伟志：《儒学的变迁》

“理”这个东西确是原孔孟学说中所没有的。那么“理”是什么呢？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这样“理”就是宇宙的根本，是“太极”，而“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说清楚了吗？我以为没有。未有天地先有“理”，这“理”是先验的，谁知道？但既然“理”的出生比天地还早，就只好认它作宇宙之根本，而“根本”是不好违反的，所以“理”也是只可遵循不可抗的。比如你不幸做了女人，那么你的丈夫就是你的“纲”。能不能反过来呢？“妻为夫纲”？那成什么话！或者谁也不是“纲”，互相平等？当然也不行。为什么？不可问，这是“理”，“天理”。但是即使你有幸做了男人却还没幸能当上皇帝，那么皇帝就是你的“纲”，因为“君为臣纲”更是“理”，“天理”。假如你家老爹还在人世，那么老爹又要做你的“纲”，因为“父为子纲”也是“理”，“天理”。所以，做了男人也不一定能得意，上下受气，里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说起来，这就颇有些奇怪了，“未有天地之先”，男人女人当然是没有的，而什么“鸟皇帝”更不知在什么地方，但“理”却比天地还在先，怎么一下会照顾到后来的人呢？“三纲五常”是“天理”，谁说的？凭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放肆地挑衅地问了，但两千年中竟没有人提出！程朱理学警告天下“存天理、灭人欲”，大家只管顺着“天理”去活或者死，别想什么心事打什么主意，从来如此，“未有天地之

先”就是如此。人们因此不明不白地活着，糊里糊涂地死去，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引以为荣的忠臣孝子贞女烈妇，唯独不见一个像样的人。中国的土地上长不出像样的人么？长倒是长得出，但一露头角，即刻被吃掉了。我们现在早已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骂作“吃人礼教”，实在是不错的，因为它直吃得我们一代不如一代，吃得我们将要灭种亡国。

第二节 穷则思变

鸦片战争中国吃了败仗，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方，结果是寻到了办洋务一方。李鸿章的主张十分具体，“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在战争中吃了亏，因此而想到要向人家学习，改良武器，希望以坚船利炮赢得独立与富强，这虽然未免短视，却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明显，这只是表层的改革变化，不可能使中国因此就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洋务之后中国屡战屡败，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在以康、梁为首的全面悲壮的变法以前，已有人在提出别样的洋务主张了。比如宋育仁说：“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宋育仁是较有远见的，在通国上下热衷于洋务的热潮中表现了难得的清醒。他提到了“法”与“器”，也即“本”与“末”的关系，认为办洋务是本末倒置的。学习西方，学什么？做过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

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是已经注意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可算作一种朦胧的觉醒意识，体现了对中国的“朝廷政教”的怀疑。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何时，总会有一帮逆潮流而动的人，所以说到有人连办洋务也反对，也就不奇怪了。“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这是大学士、“理学权威”倭仁的话。监察御使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这样，在办洋务的问题上大致已经有三种人：一种是只着眼于造洋枪洋炮即所谓“器”者；一种是开始注意到“朝廷政教”即所谓“法”者；还有就是彻底的顽固派、忠实的卫道士。也就在这中间，“文武双全”的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提出了他著名的“中体西用”学说。

张之洞是洋务派中的著名人物，不仅会打仗，而且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他认为西洋是要学的，但西洋值得他学习的也只有一些具体的技术，至多包括某些政治或经济体制，那是物质的，即所谓“器”。至于其他，他是看不起的，一概排斥，因为他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远胜于西方，所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孔孟之道，万世不变，这是“本”，是“道”，是“体”，必须永远坚持固守，在此基础上，你纺纱织布，开矿挖煤，听留声机，吃冰淇淋，“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这就

是“中体西用”，而附和这一说法的人不仅当时很多，恐怕至今不绝。洋务时代还根本谈不上人格独立的问题。

有了“夔然出于万国之上”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又有了办洋务得来的坚甲利兵，但这次却是自己一向不很放在眼里的“倭寇”，将大清帝国的辫子军打得全军覆没！打败你还不算数，还揪住你的辫子令你道歉，令你给他银子，令你划自己的河山到他的版图，令你屠杀曾经凭着热血抗击侵略的自己的同胞。这些都一一成了历史的事实，血淋淋地写在了中华民族受尽凌辱的躯体上。要亡国，怎么办？

维新派出来了，他们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热血、忧患意识与悲壮情怀，最先敏感了时代与社会的脉搏。康有为，这个后来成为“保皇会总长”的“孔教巨子”，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北京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有这样震撼人心的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康有为这一年整40，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应该变得“聪明”的“不惑之年”，却要那样的“不聪明”，怀抱狂热的政治雄心，百折不挠，屡次上书，大讲变法，要求实行“新政”。

变法是势在必行了，而且是大变、全变：“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说洋务派就是“小变”，所以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光绪总受制于垂帘